

追寻远去的风景/文化/场所/社会/习俗/还有那些集体事件/
清晰勾勒昔日法国的迷漫肖像/谨慎描绘法国的未来图景/

追 / 寻

de

RECHERCHES DE LA FRANCE

法 兰 西

la France

PIERRE NORA

[法] 皮埃尔·诺拉 著

刘文玲 译

追 / 寻 法 兰 西

RECHERCHES DE LA FRANCE

〔法〕皮埃尔·诺拉 / 著

(PIERRE NORA)

刘文玲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法兰西 / (法) 皮埃尔·诺拉 (Pierre Nora)

著; 刘文玲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201-0332-9

I. ①追… II. ①皮… ②刘… III. ①法国-研究

IV. ①D7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8825 号

追寻法兰西

著 者 / [法] 皮埃尔·诺拉 (Pierre Nora)

译 者 / 刘文玲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编辑 / 曹义恒 孙军红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484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332-9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4-6222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Recherches de la France

PIERRE NORA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13

本书根据 GALLIMARD 出版社 2013 年版译出

致我深爱的艾尔菲热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革命的牢固性	5
一 国家的降临	5
二 共和政体的起源	17
三 马克思与 1848 年革命	32
第二章 共和国的表现	40
一 儒勒·米什莱：身份特征的癥症	40
二 拉维斯：国家教员	49
三 皮埃尔·拉鲁斯的名人集	88
四 费迪南·比松的《教育法和初级教育词典》	95
第三章 国家、共和政体与革命	119
一 共和派的综合：厄尔内斯特·拉维斯的《法国史》	119
二 “法国行动”或者共和的反面	171
三 戴高乐 - 共产主义时期	186
第四章 反美国模式	234
一 革命	234
二 宪法	239
三 知识分子	245
四 记忆	260



第五章 身份认同之路·····	287
一 “代”的概念·····	287
二 国家回忆录的王道·····	326
三 法国和犹太人——相互交织的命运·····	373
四 从继承到变化·····	390
索 引·····	409
历史丛书·····	431
一 已出版著作·····	431
二 插图历史丛书·····	435
皮埃尔·诺拉著作目录·····	437

绪 论

我曾出版过两本关于法国的书：一本是《公共历史学家》，这本书希望通过个人的活动途径来勾勒出时代的特征；另一本是《现在、民族、记忆》，希望通过这三个词，体现出当代历史意识的各个极端。本书是我对法国研究工作的最后一个层面，汇总了我关于法国、法国身份特征以及法国记忆的主要论文。

这部合集的组织结构自然有序，强烈反映了一个统一的形象：一个民族国家在其成熟时期的形象。

虽然这本书分五个章节展开，但在我看来，其中最活跃、最中心的是第三章。在这一章中，罗列了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的几个主题：分析用 27 卷写成的 20 世纪初以来法国的历史；研究早已成为遥远记忆的极右派运动；同时唤起对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记忆，而这两种主义 30 多年来都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这些主题的对照恰恰表达了本书的真正议题，即：国家、共和政体和革命的相互交错。厄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的《法国历史》体现了共和主义者的综合分析，希望调解一个来自革命的法国和一个来自旧体制的法国。法兰西运动（Action française）表现的是共和主义相反的一面，是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持有不同政见，同时也表达了在超越共和政体的同时实现共和政体的愿望。因此描绘出这个统一的法国各个时代的曲折道路，直到它的分裂：从 1789 年革命到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末期，法国这两个最终版本以不同的程度融合了民族和革命性。从一个全面的民族到一个共同体式的民族，从战斗的共和国到遗产式共和国，从征服性革命到革命思想的枯竭。这是一个混合性民族计划的完结。所有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欧洲主义、独立主义或者生态主义）的突破



口只是进一步动摇了这一传统历史身份特征。

马克思从法国看到古典历史的模式，因为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到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从资产阶级的革命政体到无产阶级的斗争，法国提供了一个从历史到纯粹国家政府最清晰、最明了的发展模式^①。我倒是很愿意在改变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的同时借用他的这种表达方式。法国是一个在纯粹的国家政府中汇集了大多数支配现代欧洲甚至世界的政治参数的国家。但是，它以独特的方式经历着这种普遍性的共同使命。我通过各种途径所要理解的，通过多次接触所要描述的正是这种独一无二而又奇特的混合：曾经服务于一个即将来临的法国肖像。

在一本关于法国民族独特性的著作中，阅读到一系列关于美国的章节，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在所有离法国最近的国家当中，它们也是离法国最远的国家，是真正反对美国模式的。法国和美国的两次基本革命是在同时代发生的，法国的革命借鉴了美国革命的经验。但是，在旧世界的革命创造了一个世界并围绕世界转了一圈的时候，美国的革命依然只限于美洲大陆。尽管美国内部发生过变化，但是它的宪法一直没变；而法国跌宕起伏的民族命运却强加给法国很多宪法，每次只是在为了更好地同美国相区别时才提起美国。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说的那样，美国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国家，但是美国就是它自己本身的意识形态”。关于这一点，尽管美国的知识分子生活十分紧张^②，但在美国，知识分子没有承担法国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独特作用，也没有享受同法国知识分子一样的地位。美国因为成立的时间晚（1776年建立），所以依然生活在奠基人的承诺之下，没有承担我们所要担负的“历史重任”（黑格尔语）。革命、宪政、知识分子、记忆，这四个词、四个方面，通过比较历史，来明确阐述法国模式的基本面貌。

《追寻法兰西》这个书名，在它朴素的外表下，同16世纪中叶法国历史学家埃蒂安·帕斯基耶（Étienne Pasquier）的著作《法国研究》（*Les Recherches de*

① Ce que confirme Friedrich ENGELS dans l'Avant-propos à la troisième édition du «18 Br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 [1885], in Karl MARX, *Œuvres*, t. IV, *Politique I*, éd. De Maximilien Rubel,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94, p. 1098.

② On en prendra La mesure, pour la Période récente, avec Sylvie LAURENT, «Comment être un intellectuel de gauche aux États-Unis?», *Le Débat*, n°173, janvier-février, 2013.

la France) 遥相呼应, 可惜现在只有一些专家学者才会想起阅读这部伟大的作品^①。对那些非内行的读者来说, 最令人吃惊的是, 作者以自由的口吻, 娓娓道来各种各样的主题, 从政治机构到风俗特征, 从教堂的历史到语言的起源。读者很快会发现, 书的内容和形式统一与一致, 方法的新颖性同内容的新颖性紧密结合。也就是通过各种渊博学识的探索, 切断了法兰克人是特洛伊英雄后代的神话, 确定了(或者说“创造”了)法国高卢人的历史事实, 这就意味着在有国王以前, 在它的教堂出现以前, 在贵族甚至罗马以前就已经有法国了。

不需要进行太多的比较, 我们发现帕斯基耶的时代同我们的时代有某些相通的地方, 在一个新的时期, 即如同蒙田的《随笔集》(*Essais*) 中所描述的新的时期(而且帕斯基耶也知道^②), 我重新采用了他的书名来命名这本书。我们面临着建立线性叙事的同样障碍, 本着调动遥远的学识, 阐明现状的同样利益, 有以历史客体建立法国, 通过强有力的合法历史, 维护和证明过去的高卢民族, 现今的国家体制和共和国政体的必要性, 有着同宗教战争时期一样重新定义国家政府身份(过去是君主制度, 现在是民主制度)的紧迫性。

最后, 也许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即在《追寻法兰西》和《记忆场所》之间有什么关系? 因为在这本书中我引用了我自己在《记忆场所》中写的几篇文章。《记忆场所》是一项集体工作, 它分好几卷出版。这项工作在于研究历史积累下来的有关目前记忆的沉淀物。根据特征, 穿越时间, 摒弃所有时代的界限。而现在这本书是由我个人的许多文章构成, 前后用了 50 年的时间。这些文章基本上是关于两个世纪以来的法国政治历史。只举两个相近的例子: 在《记忆场所》中被视为封存的建筑, 就像费迪南·比松(Ferdinand

① *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 ont fait l'objet d'une édition critique en trois volumes,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Madeleine FRAGONARD et François ROUDAUT, Honoré Champion, 1996. À consulter également George HUPPERT, *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 Historical Erudition and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Renaissance Fr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0; en français *L'idée de l'histoire parfaite*, trad. P. et F. Braudel, Flammarion, 1973; ainsi que Corrado VIVANTI, «*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 d'Étienne Pasquier. L'invention des Gaulois»,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t. II, *La Nation*, vol. 1, *Héritage-Historiographie-Paysage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illustrée des histoires», 1986, pp. 215 - 245.

② Cf., notamment, Myriam YARDENI, *La Conscience nationale en France pendant les guerres de Religion, 1559 - 1598*, Paris/Louvain, Éd. Nauwelaerts, 1971, ainsi que, du même auteur, *Enquêtes sur l'identité de la «nation France». De la Renaissance aux Lumières*, Seyssel, Champ Vallon, 2005.



Buisson) 的《教育法词典》一样,或者寻找什么样的记忆能够表达“代”的范畴,现今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甚至以非传递的方式使用“代”的范畴。在这本书中却并非如此,而是将比松那部令人惊奇的《教育法词典》同拉鲁斯词典、米什莱和拉维斯的《法国历史》放在一起,形成共和国化身的长廊,或者寻找法国各“代”接替的延续逻辑性。

不可掩饰地说,在《记忆场所》和《追寻法兰西》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密切联系,即表现在主题的交叉关联,笔法的相似性以及目的的相似性。在这两本书中,都不是法国的个人历史,而是以个人的方式书写这部历史。这是一部充满光辉的历史,深入分析它的每一道光芒,都会折射出整部历史的神秘特殊性。

总之,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关注法国。我曾经开始写一篇论文(可惜从来没有完成),是关于1914年战争中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的民族思想。在最终统计政治言论中词语的出现频率时让我失去完成这篇论文的勇气。然而,谁能想到,在半个世纪以后,这篇论文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它的主题也稍微扩大了一些。它最终也没有摆脱自己的命运。也许这就是命运的讽刺性,它通过各种巧妙的途径和意想不到的迂回辗转,最后还是将我带回到出发点。

皮埃尔·诺拉

第一章

革命的牢固性

一 国家的降临^①

无论是否是革命赋予了“国家”^②这个词以协同作用和能量，毫无疑问，每一种意义对它都很合适。反过来，在国家这个词上又凝聚了三层意义。社会意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意义：制宪权相对于依宪法所创立的权力；历史意义：通过延续性，历史和未来而结合在一起的人类集体。同样对于革命，也为所有这一切赋予了它自己的动力，人们不可能将这一整体性同各种各样的名词区别对待。这些词包括：王国——正是由王国引申出民族，民族是在反对王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和国——长期以来是以体制形式为标志；政府——一直受君主制度的重商主义所感染；祖国——一直具有最令人激动最感人的情感含义；最后还有法国一词——法国的身份特征依然是由长期的历史、文化和意愿塑造而成。

*

—— 在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中，如果沿着长期的发展路线来看，“民族或国家”仿佛是来自远古时代的两种不同词义，突然间快速降临在被颠覆了的社会中，降临在马上就要被神圣化的领土上，同时又被政治化。这里所说的是两种不同

① Paru sous le titre « Nation » in François FURET et Mona OZOUF (dir.),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Flammarion, 1988, pp. 801 - 812.

② 法语中 nation 一字既代表国家的意思也代表民族的意思。我们根据原著作者所表达的概念有时会翻译成国家，有时会译成民族。——译者注



词义：一种是广泛的宗教上的跟圣经有关的意义，通过拉丁文的《圣经》和学者的语言传递下去，成为教廷传统（*gentes et nationes*）的承载者，这一概念使民族或国家成为人类物种以及各种自然分类中的一种，而人类物种的自然分类是来自创造神之手；另一种是狭义的解释，将民族同他的来源 [*nasci, naître*（出生）] 相联系，将这一概念同小团体、家庭和地方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实际经历的概念，将民族同对祖国的情感联结在一起，如同整个大世界中充满敌意的荒漠中的一片自由绿洲。这个概念后来很自然地在流亡和移民群体中被转化成祖国，我们都知道杜·贝莱（Du Bellay）和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先后强调了这一点。13 世纪，各个大学按照四个“民族”（*nations*）进行重组，而民族的双重定义在这个时期也随之明确了起来；17 世纪初，依然是民族的概念确定了第一部字典，让·尼古特（Jean Nicot）的《法语宝典》（*Thrésor de la langue francoyse*）：“不同民族的人聚居在一个城市中共同生活。”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一方面，它包括的范围很广也具有学术性质；另一方面，它的含义很狭窄并且很通俗，离我们所赋予的现代意义很遥远。但是，在这个定义中，已经混合了革命所要争取的三个组成部分，突然间变得具有现实意义并且是必要的。这三个要素就是：地理政治构成，中性多样，要求基督教社团的所有其他民族共存；福音派信教构成，具有普遍性和宗教性的潜在性；世俗邻近性构成，正如《法兰西学院法语词典》（1694 年）所解释的那样：“在同一个政府领导下，居住在同一个国家，遵守同一个法律，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所有居民。”这同菲勒蒂埃（Furetière）所给的定义比较相近（1690 年）。他是这样定义的：“（民族）是指生活在同一片封闭疆域上，具有某些限制或者受某些控制的广大居民的总称。”1771 年由耶稣会教士编著的《泰晤通用辞典》完全采用了这个定义。

然而，在那个时期，民族和祖国这两个词成为 18 世纪思想界最为发达的研究课题的一部分。18 世纪 50 年代，伏尔泰和卢梭曾经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关于“祖国”（*patrie*）的含义，往往同自由、幸福、道德相联系，这些含义来自对古代、对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他在 1738 年出版了《论国家国王思想》（*The Idea of a Patriot King*）] 式的英国的回忆，或者是对荷兰共和国（又称联省共和国）的回忆。这个祖国的定义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意思，因而伏尔泰对此持有怀疑，他认为这个定义带有国家的狭隘含义，是在专制政治下的纯粹的幻想。正如《哲学辞典》所指出的：“一个好国王的统治下会有一个祖

国；但在一个坏国王的统治下根本不会有祖国。”所以，伏尔泰同孟德斯鸠一样，伏尔泰只有在进行描述的时候才会使用“民族或国家”一词，比如“欧洲的北部民族”，或者形容英国为“富有精神而大胆创新的民族”^①。而卢梭正相反，他坚持维护各个人民的“民族特色”，保持和尊重每个民族特色。他甚至认为有必要进行公民宣誓，就像他后来在“科西嘉岛宪法计划”（*Projet de constitution pour la Corse*）提议中对岛民提出的一样：“我将我的身心、财产、意愿及一切力量同科西嘉民族结合在一起，我以及我的所有都归属于他所有。我宣誓为他而生，为他而死。”高耶院长（Abbé Coyer）极为赞同卢梭的定义，他在自己的《论旧词“祖国”和民性》（*Dissertations sur le vieux mot de patrie et sur la nature du peuple*）（1755年）中作了回应。格林（Grimm）却支持伏尔泰的意见，在1765年完成《百科全书》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的时候，以德若古骑士（chevalier de Jaucourt）的笔触确定了一个中立的综合性定义。“民族”是一个“集体词语，用来指称居住在一个国家的疆域上、固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遵守一个政府的管理的广大人民的统称”。他还补充说，民族因为它的“独特性”而有所区别。这个定义中立性很强，没有和形容词“民族的，或国家的”（National）这个词条联系在一起；而“祖国”这个词，在长期的发展变化中，总是伴随着“爱国的（人）”和“爱国主义”这样的词。事实上，关于“民族或国家”的思想在整个18世纪的讨论和发展是通过议会的传统和国家政府的改革者进行的，而不是在哲学家的讨论中展开的。议会反对皇权的专制和对路易十四派的专制主义的回忆，对于路易十四派来说，“民族不构成法国的主体”，它“完全体现在国王个人身上”，这是世代相传的契约，它将君主制度同“民族”的模糊力量联系起来；而重农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却传播着“民族消费”“民族贸易”“民族流通”“民族利益”，甚至是“民族教育”的思想。

为了使“民族或国家”这个词能够同“祖国”这个词所代表的政治讨论内容衔接起来，立刻增强它的革命意义，就应该在三级会议以及相应的各种小册子和抨击性文章发表之前对它的思想加以凝聚。它很清楚地反映了语义上的含义，就像爱伯哈德·施密特（Eberhard Schmitt）从1788年9月到1789年5

^① VOLTAIRE,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éd. de René Pommeau,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57, pp. 629 et 617.



月为编录 93 部小册子而做的语义调查一样，还有贝亚特丽斯·希斯洛普（Beatrice Hyslop）为编写教区手册^①，以及黎吉娜·罗宾（Régine Robin）为研究奥克苏瓦地区瑟米执行官的行政手册^②而做的语义调查一样。民族的思想到处绽放。人们为“议会国家”（nation assemblée）赋予了极大的权力：成立预算，编写法律，修改宗教立法，甚至撰写宪法。然而，任何一种思想也没有形成像埃马纽埃尔·西哀士（Emmanuel Sieyès）在《什么是第三等级》（1789 年）中表达的基本思想那样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如此尖锐的攻击性。根据西哀士的基本思想，要建立革命国家的概念，“如果人们剥夺了特权秩序，国家将不是缺少的部分，而是多余的部分”^③。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反映了历史情感的深度：第三等级构成一个完成的国家。边界转移到国家民族群体内部。这个思想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是在国家原则当中种下了排外的种子，提前赋予国内战争的合法性，在创立国家的同时，也构建了国家的病因。

“国家”的正式降临正发生在大革命初期，也就是三级会议的时候。当第三等级抛弃了几个世纪以来对他们的称谓，超出了将他们召集在一起的理性界线，同那年夏天所说的“旧制度”产生断裂时，由此产生了国家。传统的第三等级的授权代表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挽救金融危机，寻找补充资源。一旦关系到确定权力程序的问题，他们就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同一性质的国民议会代替旧君主制度的第三等级（建立在对各个等级的重要区别和不平等基础上），国家表达自我意识。米拉波（Mirabeau）在关于国民议会命名的演讲中提到自治机构（auto-institution）的概念，他在 1789 年 6 月 15 日提到：“我们都同意我们应该自己成立机构。但是如何成立？以什么样的形式成立？以什么样的名义？第三等级？显然这个命名并不合适。”自称“国家代表原则是一切宪法的基础”，他的同僚们是“法国人民的代表”，而不是“得到法国国家承认的议员”。我们知道，当 1789 年 6 月 17 日讨论结束的时候，在西哀士的提议下，第三等级拒绝他们原来的称谓，要自立国民议会。正如乔治·格斯多夫（Georges Gusdorf）指出的那样，共和国所有议会的宪法、立法以及各项规

① Beatrice HYSLOP, *French Nationalism in 1789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Cahi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4; 2^e éd.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8.

② Régine ROBIN,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en 1789: Semur-en-Auxois*, Plon, 1970.

③ Emmanuel SIEYÈS, *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 éd. établie par R. Zapperi, Genève, Droz, 1970.

定的组织工作都离不开词汇的演变^①。

三级会议的前几个星期是关键时期。直到那时，国家的思想既没有激起有机的一致，也没有集体意识，更没有政治组织构成，新体制在瞬间创建了它的合法性框架。转变成国民议会的形式对价值的政治等级的颠覆起了监督的作用，事实上是赋予国民代表以主权。拉博·圣-艾蒂安（Rabaut Saint-Étienne）在回应西哀士的时候说：“教士不代表国家，他只是教士。他是20万贵族或者献身于神坛和宗教服务事业的平民的集合。贵族不代表国家。”反过来，取消第三等级证实了旧式词汇的消失和国家的降临，这一点在8月4日晚上取消封建特权以及其他所有特权形式的时候得以确定。《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3条简单明了地肯定了正负之颠：“一切主权的原则根本在于国家。”除了这种法规性的文本外，如果我们还想衡量一下这个词的渗透性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找到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在占领巴士底狱两天之后，一位不知名的贡比涅居民写给杜埃的一名律师的，信中描述了刚刚在巴黎发生的事件，指出“国民军队”的形成，还写到“以国家的名义接受权利”，“所有军队都是为国家而建”^②。

*

这种主权的根本转换，从国王的一切权力来源的神权到享有一切权力的代表议会，这就最终形成了国家的基本框架。议会可以取消它的授权，随之设立的一些体制和制度组织法也会白费，权利关系及国家形态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它作为参考框架及共同存在可以想象的存在形式也将不会再成为问题。但是这种“集体力量诉求”（阿方斯·迪普龙^③）并不是革命变化的一个情节，以此来提供情感冲动。在揭开幕帘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了剧本，只是历史为它奏起了乐章。10年来没有一天不在为国家这场大管弦乐增加音符。这里我们只指出几个基本的主题。

① Georges GUSDORF, «Le cri de Valmy», *Communications*, n° 45, *Éléments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nation*, 1987.

② Jacques GODECHOT, «Nation, patrie, nationalisme, patriotism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 206, 1971.

③ Alphonse DUPRONT, «Du sentiment national», in Michel FRANÇOIS (dir.), *La France et les Français*, Gallimard, «Encyclopédie de la Pléiade», 1972.



首先肯定的一点就是这种复杂性如此之大，它是同“外国人”交织在一起，并从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哀士定理引申出来的。这个定理打破了那种抽象的神圣界限，因为太明显而毋庸多说。这种界限自远古以来就将国王同他的臣子们区别开来，从而有利于那些无数的既明显又具体的界限区分。领土界线明确规定了主权领地，在整个 19 世纪，甚至包括 20 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通过历史编撰传播旧体制下法国境内模糊不确定的思想，如同法国的边界培育了自然边境的神话。只是在近代才加以调整（比如，贝纳德·吉尼和达尼尔·诺德曼^①）证明这种国家身份的内在主题。司法界线明确规定了人民个人在权利义务上的平等性，对这些权力的实施不是来自习俗惯例，而是法律。心理界线相对来说更加细腻灵活，它使国家具有避难保护的价值，成为团体的延伸物，共同的场所，归属和联结的象征，同领土紧密联结的工具。米拉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们不能将祖国带在自己的鞋底下。”这一点没有被高估，正是这一点，国家因为进攻性的潜在力量而拥有的内容才得以加深。自从路易十六开始“背叛”在公民组织法成立时的誓言，将其置于国家权力协议之下的那一刻起，这种进攻性就应该开始转向反对国王以及王后了。它还应该以“人民自主权利”的名义以及“世界和平宣言”这一大胆的外延方式转向反对外来的敌人。1790 年 5 月 22 日，国民议会经过投票通过了“世界和平宣言”。该宣言指出：“法国放弃一些征服性战争，他永远不会对任何国家人民的自由实施武力行为。”最后，这种进攻性还应该而且尤其应该用以反对内部敌人。内部敌人开始的时候仅限于同“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相对立的贵族和特权阶级。但是，随着革命进程的加速，政治阴谋不断，革命自我组建思想也变得越来越激进，这就使内部敌人的概念具有无法确定的多样性。

长期以来，国家就同这种带有双重含义，既有敌意又有友爱的运动结合在一起。革命在它史诗般和悲剧般的叙事中，在它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传奇性色彩中，都散发出同这种既有补充性又具有矛盾性的辩证法紧密相连的情节。回顾每一段历史，它都具有象征意义。比如，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暂且不说 7 月 14 日和 8 月 4 日那伟大的日子，仅就 10 月 5 日和 6 日将国王从凡尔赛宫带

^① Bernard GUENÉE,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et Daniel NORDMAN, «Des limites d'État aux frontières nationales», tous les deux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t. II, *La Nation*, vol. 2, *Le Territoire-L'État-Le Patrimoine*,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illustrée des histoires», 1992, respectivement pp. 11 - 33 et 35 - 61.